

# 法式漢學

## Sinologie, vue par la France

李智琦

### 前言

二十世紀二零年代留學法國的李思純曾指出：「西人之治中國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一言暢論法國在二戰前於中國研究上執世界之牛耳的盛況。<sup>1</sup>法國的漢學研究，撇開十八世紀時法國耶穌會的傳教士們曾來華進行非正規的訪查不談，而從1814年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的院士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開設首個漢語講座「中國、韃靼與滿州語文暨文學」（Chair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et tartars - manchous）、成為西方漢學的濫觴來算，至今已近兩百年的歷史。法蘭西學院所開設的西方第一個漢學講座不僅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此更使得漢學在法國以及歐洲大學內被認定為一門專門的學科。<sup>2</sup>而自1893年，被稱為法國漢學歷史之父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在漢學上的重大貢獻以來一直到二戰初期，法國的中國研究有著對東西方漢學界深刻的影響。當代法國漢學最大的成就便是為西方的中國研究開創了三大先河。首先，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編纂的《中學圖書誌》（Bibliothèque sinica）開啟了後世對中國古今書籍以系統性編列圖書目錄的大門；其次，敦煌學研究也首次在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和馬伯樂等人的考古研究下展開；最後，漢學以社會學途徑的研究模式乃葛蘭

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引用法國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社會建構理論而成氣候。<sup>3</sup>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法國的漢學研究雖未若過往鼎盛，更有被美國新興的現代中國研究超越之勢，法國為西方的中國知識生產所打下的汗馬功勞卻不應因此被忽略。本文因此簡述法國如何開啟漢學研究的大門，並在該領域間的成就、貢獻及當前法國的中國研究的趨勢及與他國的比較。

### 二十世紀初至二次大戰前： 法國漢學的鼎盛時代

二戰前法國的漢學研究與成就到達了巔峰，在國際上獨領風騷，更是西方其他國家競相仿效的對象。除了前述曾提及的沙畹之外，箇中翹楚之一便是伯希和。他為法國遠東學院在越南河內創校的漢學教授。希伯和首先專研漢籍目錄的檢索以及南海地區的史地研究，自1901年至1905年



圖 1- 伯希和肖像

數次到中國考察的期間，他為遠東學院帶回了大量的漢、蒙、藏文書籍、藝術雕刻品。伯希和最大的貢獻是奠定並發揚了敦煌學，他於1908年率隊到達敦煌進行考究，除了在敦煌洞內發掘了唐代及五代的經古抄本以藏經洞內的佛史經文多達兩千餘卷，也拍攝紀載了洞內大量壁畫與塑像的照片與抄寫了洞窟內的漢文及番文，同年他將研究成果「敦煌藏經洞探訪」（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刊登於該校的《國立遠東學報》，此後，他發表包括「敦煌千佛洞」等多篇論文都在國際間獲得廣大迴響。學者評論百年來世界最偉大的六十位漢學家時，將伯希和列名第二，僅次於英國的李雅各。<sup>4</sup>

馬伯樂（Henri Maspero）在1908年11月13日首次來到了中國，正值光緒與慈禧太后燕駕、年僅3歲的溥儀被扶上王位、滿清王朝危在旦夕、中國各地出現澎湃的革命風潮之時，因此他親眼目睹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馬伯樂首先接觸的是中國歷史與語言，與希伯和一般，他是透過印度支那進一步認識中國，不過他與前者的研究方式迥異。希伯和對文獻的考據、詮釋以及辨別真偽較為重視，而馬伯樂善用早先曾在越南北部對傣族居民的社會研究模式來觀察中國宗教與社會，或許是受了同期另一位善用社會學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的葛蘭言的影響；而他最重要的著作《古代中國》（La Chine antique）則深入探討了秦朝以前



圖 2 - 馬伯樂肖像

的政治、制度、宗教以及文化史等，並以此書為出發點，繼續探究此後，特別是漢代以後的文獻資料收集與考證，不僅為法國的傳統中國研究提供了清晰的脈絡，也嘉惠了後繼的學者。

## 二次大戰後： 法國中國研究的沒落與再興

二次大戰不僅衰弱了法國國力，竟也摧殘了屹立在西方漢學界已久的法國中學研究。除了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等漢學大師的相繼殞逝頓時讓法國的中國研究出現青黃不接的窘境之外，法國在奠邊府一役中慘敗、黯然退出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一事也連帶導致法國遠東學院在當地活躍的研究活動嘎然中止。在此同時，美國的現代中國研究隨著美國在國際中成為超強、對亞洲地區積極布局之下急起直追，一消一長，也打破了過去漢學由法國獨霸的局面。<sup>5</sup>此外，法國漢學的傳統素養主要建立在對中國古典文化等以“以四書陶養成器”的研究，在此時卻也遭遇到美、日、蘇等國以強調政治與經濟面向的現代中國研究的強力衝擊。

儘管在這樣的焦慮下，法國仍然出現幾位對中國研究具有貢獻性的漢學家，主要以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謝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兩人為代表。特別是後者所著之《中國社會史》（Le monde chinois）從上古的中央集權中國出發，跨越地方霸主割據的帝國時代、宋明的官僚帝國、一直到八十年代以來的共產中國，涵蓋廣泛之深為時下少見，書中除了對各時代中國的各项技術發展有深入淺出的介紹之外，還不忘與西方同期的文明進行對照比較與交流。此書一出版，便在西方漢學界聲名大噪，不僅榮獲法國學術界至高的聖杜爾獎（Prix

Saintour)，更旋即被翻成英、西、荷、葡、義、德等多國語言在它國面世，英美及歐洲許多大學也以此作為教授中國通史的教課書，可見其所受到的重視。除了上述兩人之外，在此時的傑出漢學家還包括專長於中國古典文學、於巴黎第八大學創設中文系的吳德明（Yves Hervouet, 1921-）；另外還有對中國語言、宗教、歷史與文化有深刻研究的汪德遠（Léon Vandermeersch, 1930-）等。

早期的法國漢學家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將目光停留在對古代中國文學、文化與藝術的考據上，特別是元朝以前的中國，而清末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間的研究呈現真空，更遑論194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與現狀。這種情形要到五零年代之後才逐漸出現轉變，特別是與遠東學院關係密切的教學機構也逐步地開設研究以當代與現代中國社會與政經為主題的課程，例如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Chine）在九零年代的研究與授課主題從民國時期的都市社會，過渡到研究毛後的經濟情勢與體制改革、一直到八零年代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等內容廣泛；而國立東方語言學院（INALCO）也設有中國近代與現代史、十九與二十世紀中國經濟社會史、二十世紀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等課程；在政治研究的部分，則有巴黎政治學院（IEP de Paris）內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CERI）從事有關中國共產、中國國內政治、現代中國的對外關係等。

## 法國漢學與美歐各國的比較與檢討

如果說法國的中國研究曾在西方漢學史上創造出十分璀璨的成就，今日卻是屬於美國呼風喚雨的年代。美國自1830年才由「東方社會協會」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創立漢學研究中心，而美國漢學一代巨匠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於1928年於所在的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成立遠東學院時，曾經力邀伯希和入院主持教鞭，然而伯氏以當時美國的漢學研究不成氣候、哈佛更是窮鄉僻壤之故而回絕，以至於費正清只能另找俄國的葉理綏（Serge Elisseeff, 1889-1975）任燕京學會的首任會長，可見當時西方漢學以法國獨霸的態勢。<sup>6</sup>但由於美國對於東方學的熱誠有“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為美國對東方的擴張政策服務”的任務使命背景，使得美國在現代中國研究上的發展十分迅速。<sup>7</sup>就內容而言，美國的中國研究帶有較為濃厚的社會科學特點，有別於法國、乃至於歐洲以人文科學的知識生產為大宗，也因此，有人將漢學區分為以法國為首的傳統漢學以及以美國為首的現代漢學，法式漢學對中國傳統文化、典籍、思潮、歷史遺址、民間風俗與宗教、建築等有較大的關懷，美式漢學則是以中國現代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為重心。不過漢學抑或中學發展至今，已經出現兩種型態相互融合的現象，不管是歐洲的漢學研究還是美國的中國研究，都含括傳統與現代等跨時代、跨領域的研究主題。

至於西歐其他國家的漢學研究上，英國本身對於中國的研究向來是以經濟利益的考量為主，而超過了對中國本身歷史文化的興趣。以英美研究為中心的中國研究（China Quarterly）或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中國科學史》（Chinese Science）都帶有這種色彩。<sup>8</sup>巴瑞特（T.H. Barrett）曾指出，英國的中國研究幾乎清一色是得到美國財團的資助，否則難以為繼。對當代中國及中國轉型有興趣的英國學生多半從牛津、劍橋、或倫敦獲得介紹獲推薦，鼓勵他們到美國繼續深

造；而早期牛津與劍橋兩地只有屈指可數的教授埋首於英倫傳統的漢學研究。荷蘭卻是個例外，他們利用有限的資源，卻取得很高的成就。荷蘭的漢學研究集中在萊登，萊登的亞洲研究中心（IAS）不僅或有國家經費資助，他們也很有目標性與選擇性地從事教學與研究，並與歐洲和亞洲各國的亞洲研究保持緊密的關係，他們經常邀請美國和中國的學者前去開闢以英文授課的講座以增加該中心的國際化程度，因此荷蘭的現代漢學以及亞洲研究在歐洲十分先進。德國的中國研究發展則較為遲滯。儘管該國早在1887年便在柏林設立了東方語言論壇（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1909年也在漢堡設置殖民研究所以滿足德意志帝國當時的需求，但就成效而言卻未見其果。東德時期政府嘗試將漢學研究量集中在柏林，卻反而忽略了原本已在萊比錫地區展開的漢學研究。兩德統一之後，德國才又開始注重中國研究，除了在一些大學內增設漢學系，也增配了相關的教職名額；不過九零年代德國大學系統卻也面臨財政危機，原本羽翼未豐的漢學研究更只能被迫在求生存中發展。

## 結語

今日法國的中國研究在脫離了以古代經史考據為主的學問探究，反倒是跟隨了目前潮流對於現代中國的文史、政經、法制產生興趣。正因為如此，當今法國的中國研究卻也誠如他國一般，面臨到在知識論上的挑戰。這些問題包括來自於學者本身對於選擇研究議題的正當性、研究時的主客體不分（包括研究者對研究主題本身的既有政治、身分、與關係主張等）、陷入無意義的辯論或無法對話（例如在“中國為何”的根本性問題上進行打轉）等。另外，法國漢學也不免涉入以歐洲中心觀點對抗中國中心觀點的論戰；不過歐美的中國研究在文革後開始期盼能以中國觀點出發的知識研究，這樣的知識生產逐漸成為西方漢學的治學新寵。這些議題在當今東西方中國研究界的討論方興未艾，也是法國當今研究中學必須要面對與觸碰到的課題。

（本文作者為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政治學博士）

### 註解：

1. 見李思純，「與友論新詩書」，學衡，第十九期（1923年7月）。
2. Paul Demiéville, "Ap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Eastern Culture*, Tokyo: The Tôhō Gakkai, no. 11 (1966), p. 2.
3. 許光華，*法國漢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頁150-151；見Maurice Freedman, *La féodalité chinoise de Marcel Granet*, (Paris: Edition Imago, 1981) .
4. 見胡光澐，「百年來影響我國的六十洋客」，*傳記文學*，第38卷第3期（1981年3月）。
5. 有學者指漢學（sinology）與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應有所區分，前者指中國以外學者探求中國的經、史、名物、訓詁考據之學，而中國研究較屬於對當代與現代中國的社會科學分析。不過sinology的廣義其實包括了整個中國知識學，可說是把Chinese studies所探討的內容納入其中，有關兩者間更為深入的討論，可參閱許光華，同上註，「序二：漢學歷史和學術型態」。本文將漢學與中國研究交互使用，同指一義，特別在二戰前多用漢學一詞，二戰後改用中國研究一詞。
6. 黎鳴，賈玉文，*費正清自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頁117。
7. 見侯且岸，「費正清與中國學」，李學勤主編，*國際漢學漫步*（上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8. Helmut Martin, 廖天琪譯，「德國的中國學研究——歷史、問題與展望」，仁繼愈編，*國際漢學*（河南：大象出版社，2005），第十三輯，頁29。